

# 倾听译者的心声:《庄子》英译本序跋研究

刘 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提 要:** 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领域,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和译文的周边文本越来越受关注,而译文的序跋因其直接表达出译者的心声,对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主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庄子》各个英译本的序跋,总结译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以期为《庄子》英译及其它典籍英译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同时给翻译实践和译作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序;跋;《庄子》;译者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3-0096-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3.019

## Understanding the Translators: A Study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Zhuang Zi*

Liu Ya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paid their attention to translators and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ranslated works. Thes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onvey the ideas and thoughts of translators, and thus they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especially studies on translato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Zhuang Zi*, and summarizes some core problems concern the translators. In this way, the paper intends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of *Zhuang Zi* and other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and to give some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translators and their works.

**Key words:** preface; postscript; *Zhuang Zi*; translator

### 1 译序跋概述

译文的序和跋是分别附在译文前面和后面的说明或介绍性文字,一般用来介绍作品、原作者等背景知识,说明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等,以此来架起读者和原文、读者和原作者以及读者和译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孙昌坤认为,译本的序言是“译者同读者对话的开始”(孙昌坤 2005: 54)。

在典籍翻译中,大多数译者都会通过附加大量的序、前言、后记、跋、注等“周边文本”介绍和分析所译作品,对翻译情况作简要说明。除了背景介绍,译序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反映译者心声,是译者翻译思想的承载者。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对原作者的理解程度和对原文的把握程度对译文最后呈现的面貌会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要素大多在译者的序跋中有所显现。因此,序跋可以作为研究和评价译者以及译作的重要依据。

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译书的序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翻译文论参考篇目”中可以看到,“序”、“后记”、“跋”、“引”、“叙”、“叙例”、“序例”、“例言”、“译例言”、“后序”等篇目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材料是梳理我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如支谦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陈福康 2000: 6)。严复《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同上)。鲁迅的翻译思想很多也体现在其众多译本序言中,这些译序跋已经收集在《译文序跋集》中出版。其他如道安、徐光启、林纾、傅雷、郁达夫等翻译大家都很注重译文序言跋语的书写,他们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都出现在各自所译之书的译序中。

西方翻译界的情况也是如此。谭载喜指出,英国 16 世纪的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加前言和后记来与读者沟通,

译者受此影响也通过前言和后记来告诉读者其翻译目的和方法(谭载喜 1991: 91)。可见,在翻译理论研究独立开展以前,西方同中国一样,译作的序跋含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梵第根就曾指出,译者的序文提供最可贵的材料,它们会告诉我们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告诉我们译者的态度。(梵第根 2010: 133) 这些序文有时还答复那些指责和攻击的言论,以此来为原作者或译者辩护。

## 2 《庄子》英译本序跋的分类研究

典籍翻译因原作的重要地位、成书年代的久远及书中蕴含的独特文化、思想等,翻译起来相对较难,读者接受也有难度,所以一般译者都会附有较长篇幅的序言跋语,有的甚至附上一些研究成果。在哲学和文学等方面,《庄子》均堪称中国古代书籍的典范,翻译该书对任何译者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因此,《庄子》的译者大多在译文前附有长篇序言。现有《庄子》译本的序跋主要涉及两大类内容:一类是背景介绍,另一类是翻译计划及心得。西方很多读者可能从没听说过《庄子》,鉴于《庄子》在中国哲学、思想、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译者认为有必要使目的语读者事先知晓相关背景。译者一般会介绍中国古代各家的学说、道家各个代表人物《庄子》的哲学思想、关键术语等《庄子》内、外、杂篇的分类《庄子》的文学特征等。简言之,在《庄子》英译本的序跋内容中,第一类就是庄子其人其书的介绍,目的是提供给读者背景知识,便于读者理解及增加兴趣。这些背景的介绍会反映出译者对《庄子》的理解程度。

第二类序跋内容主要指译者直接表明的翻译计划和心得,包括译者表述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困难、对其它译本的评论等,能最直接体现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声。这部分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2.1 翻译目的或起因

自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兴起以来,翻译目的不断被研究者提及。功能翻译派认为,翻译行为由翻译目的决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语境和预期功能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由此,翻译目的在翻译批评中的地位就凸显出来。《庄子》的译者在译本的序言中大多都提及各自的翻译动机,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介绍哲学思想、获得更多的读者和“完美”地描述最真实的庄子。

有些译者翻译《庄子》主要为了介绍和传播庄子的哲学精神,代表人物有冯友兰、杨国荣等。冯友兰是第一个翻译《庄子》的中国译者,他的译文把重点放在哲学思想的译介上。冯友兰在序言中指出,《庄子》首先是一部哲学作品,当时已有的两个全译本并没有反映出庄子真正的哲学精神(Fung 1931: v)。所以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课程中使用自己的译文来讲解中国哲学思想。杨国荣与

霍希曼(Höchsmann)合作翻译的《庄子》也意在介绍中国的哲学思想。他们在前言中提到“我们希望呈现给读者的庄子是置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庄子,我们把庄子与西方哲学传统结合起来”(Höchsmann, Yang 2007: xi)。研究中西哲学的杨国荣与霍希曼希望西方读者可以从他们的译文一窥“道”的深意,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

另有译者的翻译动机是使《庄子》获得更广泛的读者。从《庄子》到《庄子》的译文要跨越漫长的时间距离,克服文化的隔阂,并且解读《庄子》本身的难解之处。如果译文通篇晦涩难懂,西方读者很难有耐心读下去,而传播《庄子》的第一步就是吸引读者。威厄曾指出,“专家们自然不用借助我的译文来理解”(Ware 1963: 13),所以他翻译的首要目的就是让普通读者能读懂《庄子》。帕尔默用一句话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翻译意图“期望我的译本更受欢迎”(Palmer 1996: ix),其译本在企鹅出版社出版多少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序言都告诉我们,《庄子》的译者越来越重视译作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程度,希望扩大读者群,让更多人了解《庄子》。

还有一些译者对庄子其人其书评价极高。出于对《庄子》的热爱,他们的译文多追求完美,尝试从各个方面展现《庄子》的与众不同。比如汪榕培发现英美人“在理解汉语原文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其目标就是“让《庄子》以其真实面貌从东方走向西方”(汪榕培 1999: 41)。梅维恒的译本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赞誉,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认真和天赋,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庄子的极度热爱以及由此产生的介绍《庄子》的迫切愿望。他说,“我翻译《庄子》的一个很大目的就是我认为《庄子》值得为更多西方人知晓”(Mair 1998: xiii)。他认为,从各方面来说《庄子》都是一部比《道德经》更伟大的作品。梅维恒除了希望能准确地传达庄子的哲学思想外,他还想让读者知道庄子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从序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译者由于对《庄子》倍加推崇,所以非常希望完美地呈现《庄子》各个方面的优秀之处。

### 2.2 翻译原则和方法

关于翻译标准和原则的探讨很多都出现在译序跋中。在《庄子》各译本的序言中,很多译者,特别是力图展现《庄子》文学性的译者,都提及各自翻译《庄子》时的原则和方法。其中涉及最多的就是原文的形式如何再现,意义如何传达。

《庄子》独特的语言魅力使得译者很想把这种奇妙的言说方式传达给读者,直译是他们最多用到的翻译方法,译者在译序中多次提到直译。比如汪榕培就表示能够直译的尽量直译,“用原文的对应词语或对应结构来翻译”(汪榕培 1999: 42)。他翻译的总原则就是要“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汪榕培 1999: 41)。梅维恒的原则也是尽可能地再现原

文,“使读者阅读时产生的感觉与一个研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生阅读时所获得的感受一致”(Mair 1998: xlvi)。梅维恒所说的就是效果对等。要达到这样的对等效果,梅维恒认为,即使在原文风格不统一的情况下,也应尽量保存原味,避免同化处理。(Mair 1998: xlix) 由此,其翻译策略清晰地表达出来。华兹生也追求效果对等并赞成直译。比如他在序言中写道,尽管译成的英语有时会显得有些奇怪,但他仍然坚持直译,紧随原文。因为“庄子对语言突破传统的运用方式值得译者至少去试图表现出来,这样才对得起庄子那丰富的想象”(Watson 1968: 19-20)。另外,他还主张运用俗语或口语来翻译《庄子》,以便译文词语和结构的感受更接近原文。(Watson 1968: 20) 当然,也有译者认为有些地方不能直译,比如哈密尔和希顿认为,《庄子》是言语简洁的哲学文本,直译是最不讨好的,还列举了冯友兰和梅维恒对“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一段的翻译,并与自己的译文对比。(Hamill, Seaton 1998: x)

有少数译者提到关于韵文及意象的翻译。梅维恒说,他在翻译时尽力反映出作品的诗性,“忽视诗性而仅把它当作哲学作品来翻译是对《庄子》极大的不公”(Mair 1998: xii)。华兹生也特别指出,庄子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篇之一(Watson 1968: 19),所以,他翻译时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原作的意象。他特别列举“德充符”中的一段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於心者也。”其中“与物为春”几个字,华兹生翻译为 make it be spring with everything。他认为,这几个字的字面意义,或者说逐字翻译过来就是 with things make spring,这正是庄子诗一般语言的体现。如果译为 live in peace with mankind 或者 be kind with things,虽然表达流畅,却“完全破坏了原文的意象,让读者以为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实际上却是庄子在语言运用上的创新”(Watson 1968: 19)。

译者们也提到翻译时要注意译文的流畅。如汪榕培提到,“在可能出现辞不达意或可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用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汪榕培 1999: 42)。在梅维恒看来,《庄子》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Mair 1998: xi),所以他希望读者阅读译文时不受晦涩术语的影响,否则就会妨碍读者欣赏这部既有趣又有智慧的著作。

其他译者也只言片语地在序言中提到了翻译原则或方法。格雷厄姆在阅读大量的文献后得出结论:翻译《庄子》不必完整翻译全书(Graham 1981: 31)。原作很多地方真伪难辨,翻译得越多,传达给读者的可能反而越少。所以他的译文与众不同,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他把《庄子》各章分析归类,并按自己的理解重新编排了顺序。

### 2.3 翻译困难

在翻译《庄子》这样的古典杰作时,译者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困难。译者在序言中谈及翻译困难,一方面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作这些难以言表的部分,另一方面也给其他译者提醒,使后来译者加以重视。总结各个译序,《庄子》英译的困难主要源于其语言的简练和意义的模糊,即内容与形式难以统一,这是文学翻译大多会遇到的问题。《庄子》作为“先秦诸子莫之能先”并影响历代作家的文学杰作,这种两难的境地更为突出。

准确地理解《庄子》的意义是困扰译者的大问题,也给译者增加很大的工作量。他们需要研读大量资料,反复比较,做出取舍。如翟理斯提到,他参考的汉语评注版本有6本之多(Giles 1980: 16)。他认为,这些代表不同学术派别的声音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在阅读过程中,如果遇到各家见解一致,他则遵从他们的意见;如果遇到各家见解相左,则选择译者认为与庄子的哲学思想最一致的那种解释。如果他认为各家都没能理解,则转而听从庄子最真实的声音,即译者本人与众不同的理解。华兹生也提到,对《庄子》的多种解释和理解的部分随处可见,这种情况比任何其它的中国典籍都要严重(Watson 1968: 23)。对于争议之处评论家们也没有定论,只能是不断质疑译者对意义的选择。

《庄子》中有许多不言之言和言外之意,其表达意义的语句都很简短。如何用简短的英语句子传达出同样的信息量,让译者们大伤脑筋。霍希曼和杨国荣指出,《庄子》行文极简,很多时候要抓住庄子所表达的意象才可能理解其义(Höchsmann, Yang 2007: xi)。译者的两难境地是:或者使译文简练但不易为读者理解,或者给出诠释式的较长译文,但失去庄子的精髓。韦利也认为,中国成语太简洁,想再现这种简洁,同时又使译文易懂并有连贯的韵律几乎不可能(Waley 1963: 13)。

此外,如果想同时兼顾哲学性与文学性似乎很难。格雷厄姆眼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庄子》既是哲学著作又是文学巨作(Graham 1981: 33)。他感叹如何平衡庄子作为哲学家和诗人是一个大问题,译者需要不断在不恰当的表达法和意义传达不确切之间选择。

总之,《庄子》的杰出之处展现在各个方面,译者常常顾此失彼。传达一方面已经不容易,而想要再现各个方面是难上加难。翻译《庄子》对任何译者都是一个挑战,译文很难把原文各个杰出的方面都忠实地反映出来。

### 2.4 对其它译本的评价

动手翻译之前,除了阅读全文和阅读相关研究书籍外,译者的准备工作还包括阅读和比较先前译本等。《庄子》的很多译者在序言中都提及前人的翻译成果,或是对自己借鉴其文表示感谢,或是赞美某些译者,或是对比总结各个译文,或是指出先前译文的不足,以明示自身译文的目的与特点。

在译本序言中,汪榕培对其它译本的点评最为细致。

他用6页的篇幅把之前几乎所有的全译本和选译本一一从总体上作了评述,言简意赅,不仅对读者和后来译者有引导作用,对《庄子》英译研究也有参考意义。

格雷厄姆的点评也比较详细,他眼中的理雅各、翟理斯和华兹生分别是他们各自时代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秀的译者。他讲到,翟理斯的译本影响了英美两国的作家,如王尔德和米勒;华兹生的译文词语生动,并且主要的哲学术语在翻译时保持一致(Graham 1981: 30)。

华兹生眼中的韦利译文虽然只是片断,但既具可读性又最真实(Watson 1968: 28)。他还提到,莫顿(Merton)的译文是《庄子》某些篇章的仿写,反映出庄子的诗性特征,读者从其译文可以一窥原文的文学表达手法。帕尔默、霍希曼等也都对之前译者作了点评。

不少译者在序跋中也提到前人的不足,以告诉读者自己的新译本有哪些值得一读之处。翟理斯的译文是第二个英文译本,他认为之前的译者巴尔弗的汉语水平只是入门级水平,不能担此重任(Giles 1980: 18)。格雷厄姆在点出他认为的优秀译者后,随即指出他们的局限性在于囿于已有的研究,不能突破传统,所以呈现给读者的《庄子》是一部与现行本一致的、散文式的、有章节和段落的译本(Graham 1981: 30),没能抓住庄子在篇章、语言及哲学等方面的要义。然后格雷厄姆解释自己的翻译计划——重新编排章节和先后顺序,做些必要的删减。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认为韦利是最伟大的汉译英翻译家。单从所译内容的选取来看,韦利是唯一一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译者,因为他只是选取了一个个片断来翻译(同上)。华兹生指出,翟理斯采用的维多利亚式的老式英语不太适合翻译原文难懂而又优美的语言;理雅各在重现原文的字面意义上花费很多功夫,但有时会误解庄子的意义;威厄的译文有许多独特的术语,但他把庄子描述成儒家进步的代表引起很多的争议。在林语堂的译文中,佚文趣事的翻译可称上佳,但其目的是评论《道德经》,《庄子》作为论据被删减、重排,这就很难欣赏到原文的形式。(Watson 1968: 27-28)

译者并不讳言翻译时对其他译文的借鉴。华兹生提到翻译时参考了几个已有的英译本,包括翟理斯、理雅各、威厄、冯友兰、韦利和林语堂;冯友兰也提到借鉴了理雅各和翟理斯的译文。他说,“如果他们的翻译理解正确,没有必要只为了有所不同而一定用新的表达法。对一些有关键作用的术语、词汇、篇章,如果改变后会有很大的不同,就会按照自己对庄子哲学的理解给出新的译法”(Fung 1931: vi)。林语堂也表示曾经参考了翟理斯的译文。

### 2.5 姓名和音译的问题

有些译者在序跋中专门提到了人名翻译的问题。人名的翻译主要是音译和意译,音译即人名的转译或转写,

主要涉及到威妥玛-翟理斯体系(Wade-Giles)和拼音两种体系。用什么体系注音本来一看便知,有些译者在序言中说明主要是给读者做出解释。最初的译本只有威妥玛体系,拼音出现后,有的译者也用威妥玛。威厄的音译就采用威妥玛-翟理斯体系,有撇号隔开的辅音可以按英文的发音大概读出。(Ware 1963: 14)帕尔默也选择了普通读者熟悉的威妥玛-翟理斯体系,但是把撇号去掉以使阅读连贯顺畅,如Ai T' ai-t' o变成了Ai Tai To(Palmer 1996: ix)。霍希曼和杨国荣的译本使用拼音,他们认为这是当下普遍采用的方法(Höchsmann, Yang 2007: xii)。

人名的翻译不只是转写这样简单。《庄子》中众多的人名有依托历史的,也有杜撰的。庄子靠名字赋予笔下人物特殊意义。对于某些人物的名字究竟是转写还是翻译,各家有自己的看法。梅维恒说,对于庄子笔下想象的人物,他不是转写,而是要翻译过来(Mair 1998: lii)。这些名字都有双关意义,对故事的展开有作用,如果不翻译出来,就会失去理解的钥匙。辛顿(Hinton)也指出,《庄子》中名字的使用是作者的一种文学表达手段,所以需要翻译(Hinton 1997: xix)。对于虚拟人物的名字,中国读者读起来知道是文字游戏,有时整段的意义都靠名字的意义来表述。

### 2.6 核心词的翻译

《庄子》思想和哲学概念的传递很大程度上依赖核心词汇的翻译。这些核心词汇翻译得好可以事半功倍,翻译得不好则会影响读者对全文的理解。有些译者在前言中提到对《庄子》中某些关键词的翻译。如华兹生提到,他把《庄子》中的“道”译为“the Way”,还讨论了庄子的“道”和其他如墨子、韩非子等的“道”的不同(Watson 1968: 24-25)。他把“天”翻译成“Heaven, heavenly”,还提到“德”的翻译,把“无为”翻译为“inaction”,“游”翻译成“to wander, wandering”。威厄也提到了关于“德”字的翻译,还有一些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概念,不能翻译,只能转写,如“阴”和“阳”等(Ware 1963: 13-14)。哈密尔和希顿提出,翻译术语时前后要保持一致(Hamill, Seaton 1998: xvii)如“天下”的翻译,“天”、“地”、“仁”的翻译。

以上几个方面译者在译序跋中关注最多。译者有时也把其译文的格式、体例等作简要介绍。如帕尔默在序言中告知,如果原文不是连贯的论述,他的译文则在中间断开,使读者知道这是段落合集而不是完整的论述(Palmer 1996: x)。翟理斯也提到,在他的译本中除译文之外,还有评论夹杂在文中,希望读者阅读时能了解庄子的典故(Giles 1980: 18)。吴冲在前言中提到,以前的译本在译文中都没有注释和评价(Wu 2008: 18)。因为庄子用词意义隐晦,如果只有脚注就不能使读者完全明白。给出注释和评价能使读者更好地欣赏故事和理解作者深邃

的思想内涵,因此,他的译文几乎在每个段落后都有注释和评价。

### 3 结束语

从篇幅长短看,《庄子》大部分全译本及选译本都有较长的背景知识介绍,这一现象反映出译者对读者接受度的普遍重视。他们希望序言中关于庄子其人其书的介绍能够架起一座连接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桥梁,使读者在阅读全文时能比较顺利地走到中国古典文化当中去。

从各译本序跋涉及的内容看,译者最想传递的信息涉及翻译目的、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翻译困难、人名的翻译以及《庄子》中一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传递等。译者首先最想告诉读者的就是他们的翻译动机,包括介绍《庄子》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使译文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传递《庄子》的行文之美等。在明确译者的翻译动机后,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关注译者最想传递的信息,这样读者更容易对译文持赞成态度。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原则和方法。《庄子》的译者主要提及的原则和方法包括直译、套用对应英文表达方式、意象再现等。而中西文化的不同、哲学思维的差异和《庄子》文学上的成就都造成译者的翻译困境,译者经常陷入两难的境地。《庄子》译者大多在序言中提及以前译者和译文,这些评价或褒或贬,言语中肯。

读懂译者的心声、了解译者最关注的问题和他们遇到的难题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提升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功能目的翻译理论兴起后,译序跋作为最直接反映译者动机和操控的因素更加受到重视,它们对公正地评价译本和译者起着重要的作用。评论者可以设身处地地把自己置身于译者的社会语境中去看问题。译者的心声对后继的翻译工作也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后继译者在动笔之前要对先前的译本有透彻的了解,以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研究译本序跋对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典籍走向世界必然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00.

梵第根. 比较文学论[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10.

孙昌坤. 简论译作序言跋语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 2005(1).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汪榕培. 庄子[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9.

Fung, Y. *Chuang Tzŭ: 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 [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1.

Giles, H. A. *Chuang Tzŭ: 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 [M]. London: Mandala Books, 1980.

Graham, A. C. *Chuang-tzŭ: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ŭ*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Hamill, S., Seaton, J. P. *The Essential Chuang Tzu* [M]. Boston/London: Shambhala, 1998.

Hinton, D. *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 [M].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1997.

Höchsmann, H., Yang, G. *Zhuangzi* [M]. New York: Pearson & Longman, 2007.

Mair, V. H. *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almer, M. *The Books of Chuang Tzu* [M]. London: Arkana/Penguin Books, 1996.

Waley, A. *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3.

Ware, J. R. *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 [M].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1963.

Watson, B.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Wu, C. *The Wisdom of Zhuang Zi on Daoism* [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8.

收稿日期: 2014 - 12 - 29

【责任编辑 王松鹤】